

簡陽在軍閥割據混亂時期遭受災難的概況

曹北姜

簡陽為成渝通衢，在軍閥混戰二十年中，川中大小戰役四百余次，多遭受到戰爭的影響。本人在縣工作四十余年，茲將所見所聞，并參考簡陽縣志、簡陽中學校史等有關資料，又承李夢余同志提供一些當時駐簡軍隊殘民以逞事實，綜合整理，紀錄如次。未盡之處，尚望知其詳情者予以補充和更正！

一、籌款 預征 苛捐雜稅

軍閥壓榨人民，好像窩跑運動，一個趕過一個。

1917年（民國六年）11月，駐軍汪司令官向本縣富紳勒索借墊銀幣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元。

1922年（民國十一年）5月，二十一師羅旅長向各保借墊銀幣八萬元。同年7月，劉存厚總司令向各保預借銀幣三萬元，8月，向富紳預征銀幣三萬元，11月，向各保借墊銀幣二萬五千五百元。

1923年（民國十二年）1月，劉存厚部由各保借墊銀幣二萬元，3月，又由各保借墊銀幣二萬元。同年2月，鄧錫侯、陳國棟各師向各保預征銀幣五萬元；5月，陳國棟師又由各保借墊銀幣六萬元。6月，賴心輝總指揮向各保借墊銀幣三萬元。這一年，除上述部隊征借外，各軍又搜括銀幣七万余元。

1924年（民國十三年）田頌堯總指揮駐縣，全年籌款分列如下：①2月份，由各保借墊銀幣一萬元；②4月份，由各保借墊銀

币二万元；③5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六万元，同月，又由各保借垫五千元；④土药摊派（鸦片烟捐开始），向龙泉驿借垫银币七百五十元；⑤6月份，由各保借垫六万元；⑥8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十万零五千零二十四元；⑦10月份，由各保借垫银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六元；⑧田部孙德揆旅长另向各保借垫银币八万四千二百四十元；⑨11月份，向安杨保（即杨家乡）借垫银币六百七十九元；同月，孙德揆旅长又另向各保借垫银币五万一千元；⑩12月份，孙德揆旅长又向各保借垫银币四千零五十元。这一年，田颂尧部在县中光是向各保借垫的款就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九元。其他捐款尚不在内。这一年开始预征1925—1929年粮税，连同开征本年的粮税，一共征了六年的粮。

1925年（民国十四年）1月，四川军务督办杨森，令由各保借垫银币十四万六千元。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统筹粮税二十四万元，以1934—1935年粮税作抵。又筹地款捐（鸦片烟捐）三十九万五千元。

自1924年田颂尧摊派土药捐以后，连年都征收鸦片烟捐，并缠粮征收，直到1930年。

1931年，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部队驻县，他将烟捐增加到一百万元。

以上所述各军向地方借垫的款，係以粮税作抵。当粮尚未开征

时，就以“军饷预征”为词，命令地方保甲借垫。地方保甲一面措款上交，一面向老百姓征取，并将借款的利息和一切用费浮加上去，地方保甲和经手人等从中吞没一部份。实际上，老百姓所出的粮税远远超过借垫的数额。

本县自1924年（民国十三年）开始预征粮税以后，每年预征，多至五年，少则两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已预征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截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止，已预征到1956年（民国四十五年）。真是骇人听闻！1934年，刘湘主持川政，川局形式上趋于统一，粮食预征虽告停止，但田赋加重，人民的负担并未因此而有所减轻。

1933年以前各军在简阳的苛捐杂税，除田赋之外（正粮外，还有许多附加随粮附征，往往超过正粮），又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税捐的名称繁多，不胜枚举，其中最奇特的有所谓“国防捐”。如1930年，李家钰的部队，本来驻防在简阳、遂宁、安岳、乐至、遂溪、潼南等县，居四境中心，他为了准备内战，争夺地盘，竟至以“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的名义征收“国防捐”。（派时美其名曰“乐捐”，收时常派队押缴）1932年，刘文辉所部犯侵入金沙江以东的西康地方部队出退回金沙江以西，本是同室操戈，亦以“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名义相继征起“国防捐”来。又有所谓“烟捐”，李家钰部自入驻简阳时，由于当时烟禁大开，鸦片烟已成为简阳的“特产”，驻军对种烟的，以禁烟的名义征收烟税，其名为曰“寓禁于征”；

对不种烟的，征收“懒捐”，说你为什么要懒，就得予以按地亩科税。种要征税，不种也要征税，总而言之，征税了事。在李家钰驻防时期，地方保甲还征有什么“草鞋捐”、“扁担捐”（对象是穿草鞋、扛扁担跑太路卖劳力的人，保甲长认为他们每天找钱多）等。真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无奇不有！

二、在横征暴敛下 人民遭受的苦况

1. 预征粮税。地主纳税，本身并不受到怎样的损失，也只不过是将其应缴粮税转嫁在佃农身上，连年加租加押，提前催收，致使一般贫苦佃农，几至无以为生。至于有少量土地的贫农，由于无力缴纳，每当征收局严令催收扫解时，便遭受地方保甲锁押追缴，农民在此催科痛苦之下，只好忍痛将土地贱价出卖，以求暂舒目前倒悬之苦。有的农民甚至出卖了土地还不够缴税，只好逃避他乡；有的土地卖不出去（当时赋额不平，有些粮轻，有些粮重，粮重的自然不好卖出），甚至深夜将红契贴在门上，乘夜逃走，不顾生死，以能逃出魔掌为幸。预征粮税，不管向富绅借垫也好，向保甲借垫也好，归根到底，还是农民受苦受穷！

2. 小土地出租者为了措缴预征粮款，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到山穷水尽时，亦只好将产业出卖了事。

3. 普遍征收鸦片烟款，不问种烟与否，都要出款，以致遍地烟花，粮食生产大减，影响民食至鉅。

3. 关卡重：苛援商旅。单以抄商税的关卡而言，陆路，在龙

泉驛繳了稅，到石橋又要繳稅；水路，在養馬河繳了稅，到平泉鎮又要繳。員司查驗刁難，商人為了避免耽延，只好向員司行賄，但一切費用，皆加入貨價出售。受敲詐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編者按：國民黨偽中央勢力入川後，征稅关卡更是有加無已，如偽川康查緝處簡陽稅局既在石橋設有查緝分所，檢查河下船隻；又在石橋西端楊柳溝地方設置盤查哨檢查陸路，更在簡城外北溪沱江油房河地方設卡，檢查汽車和上下過道船隻。路途不到十里，就有关卡三處。石橋鎮商會曾具呈呼吁，請裁撤油房河盤查哨，以恤行商。見1945年1月12日《四川商聯月刊》第三期）

三、亂軍所至 倉廩一空

縣存常平倉京斗（係上“皇糧”的斗，每斗重約三十四斤）谷八千七百二十六石四斗五升；鄉倉常存市斗（指當時河下大行市的斗，每斗約重三十二斤）谷九千零六十六石九斗六升。1917年，滇軍羅佩金部隊在成都為川軍擊敗，退至縣城，逗留月餘，開始竊食常平倉谷，以後駐縣各軍間亦竊食，至1923年，川軍賴心輝部駐縣時，大量竊食，於是簡陽縣的倉谷耗損顆粒無存。

四、估拉夫役 阻塞交通

民國以來，連年兵禍，縣境為川東川要道，軍隊往來如梭，每遇戰事發生，或軍隊開拔，城廂內外，遍地拉夫，動輒數百名，或一千名，幽閉在舊日教養工廠，不問是否農忙時間，常禁閉，竟有餓死者，一旦當差，或補充兵役，久不放回，流為餓殍，轉死溝

整。1929年川滇黔之战，死者不可胜数。县境当道场镇如龙泉驿至杨家街，平泉镇至施家坝等处，团保办理夫差，供不应求，则申请县署令飭附近各保轮流派丁帮给。各乡因夫差派款纠纷，县署积案如积，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夫差各费合计各乡前后所出夫差费，殆在百万元以上。

成简、遂简马路通车后，一遇战事发生，汽车概被军队挡去供军事运输，行旅无法乘车。

拉黄色车及抬筏竿谋生的贫民，为了避免拉夫，有时躲藏太久，无以为生。

败军溃退，不分青红皂白，逢人便拉，藉以掳索钱财，以致东大路不时闹得来路断人稀。

因战事交通断绝得最久的是1920年，川滇黔之战，沿东大路都驻得有滇军，分段设盘查哨，对过往行人百般留难掳索，在相持两个月时间，商旅裹足，交通为之断绝。

（普安农民魏么哥，在1931年，被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军第二师王元虎被拉去，一年多才逃回，他的妻子和其小儿女在魏么哥未逃回时，乞讨过活。解放后，魏么哥翻身了，曾任普安农会第九分会主任，今昔对比，判若天渊。——笔者附记）

五、破坏房屋 搜索利掠

1916年（民国五年）6月19日，蔡松坡率滇军道经简城西上，川军周骏师王陵基旅在石桥铜观音山上，用“六棱炮”轰击县城，破

坏房屋很多，滇军在城内大肆劫掠，1917年（民国六年）滇军罗佩金部由成都进驻县城月余，士兵肆意抢掠，十分之九的人家都受其害。

1931年（民国二十年）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军第二师王元虎旅，逼走四川边防军李家钰所部李青廷旅的部队，王元虎部散驻简阳城乡，挨户搜索财物，十室九空。

1916年至1926年间，川中内战，常进退于东大路上，县属由龙泉驿至杨家街，路当孔道，凡公所旅栈的棹凳林具，以及门窗糊壁，大都被过境军队强借拆毁，作为燃料，许多旅栈和茶房酒店用石头制成棹凳床铺，代替使用。到解放前一两年，茶店子的栈房尚有当时的石头床铺遗迹存在。

六、强驻学校 破坏文物

简阳中学校，原在县城西街，在川局混乱当中，教室桌几板凳床榻什物，概被损毁，教室桌凳，至用石板、石椿代替。经常驻兵，房屋破坏不堪再住，县人为了避免兵灾，乃于1929年择地沱江东岸射洪坝另建校舍。

中学创办时，接收通材、凤山两书院的线装古典书籍近三万册。连年兵乱，士兵用书垫床，冬日则堆积燃烧取暖。甚至明目张胆携出售卖。县中的坏人亦趁火打劫，乘兵乱混入窃取。因此，至一九三三年迁往新校时，线装书籍只剩残编断简三千余册。

七、县人的呼吁和反抗

当派借预征，层出不穷，县人苦于罗掘俱穷，曾先后电恳田颂尧总指挥、邓锡侯督办、刘文辉主席（刘身兼四川省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军总指挥三职）酌予减轻，以纾民困，但皆置之不理，而催迫扫解，更为迫切。（当时笔者在县中校教书，县中法团士绅推我执笔，电文已记忆不起了）

1926年，过境军队，在乡骚扰，激起东乡门户练丁与军队战于湧泉寺、施家坝等处，双方都死伤多人。

1932年春夏间，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军第二师陈鸿文部队在县中骚扰不堪，激起民情，恭马河一带的地方武装起来对抗，如临大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陈书农新归附刘文辉，为讨好于刘和县人，特回县调解，一场灾难，始得倖免。

八、川局混战造成的恶果

1. 办夫办差，复杂繁难，又兼时间迫切，于是各地多假手哥老会舵把子、管事承办，使哥老会干预地方政事，恶势力潜滋暗长，为后来横行乡里的根源。

2. 在川军混战中，每当驻军撤走时，为了达到携款而去的目的，对各县团正（即后来的联保主任、乡长）缴款予以回扣。例如：实缴二万元，驻军就以三万元的印收（收据）与他，而团正对本乡民众，则照印收的款额三万元摊派，并加收垫款的子金和其他一切费用，以饱私囊，为后来乡镇长向人民摊派滥派、贪污中饱的开端。

3. 派借预征，层出不穷，自耕农和小土地粮户被迫出售土地，

使土地更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县中有名的军阀田颂尧、刘厚等辈，无不拥有土地在万亩以上，其他较小的军阀和大地主等，亦无不乘机兼并，土地亩数，亦大量增加。以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从拥有大量土地的军阀豪绅，对预征粮税，除转嫁在佃农身上外，恃其恶势力完粮不过敷衍了事，或至抗拒不缴（田颂尧的族弟田亮熙欠了西三年的粮，因县人控告，县府不得不理，命秘书曾兆姜前往严追，田完了一些，敷衍了事。至于大军阀所欠的根本不敢过问），粮税征收不足，只得又继续预征。所以预征粮税，实际受害者还是广大农民。

贫民靠劳力谋一家生活，既要躲避拉夫，又要负担杂款，走投无路，生活更为惨剧。

编者附记：这里附带介绍本县另一个大军阀陈书农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他的土地不在本县，而在川西坝。据草池徐家礼先云：1920年，他在成都读书，是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前往糠市街刘松龄家去会晤草池乡人袁伯融。袁在刘家充当私塾老师。刘係陈书农的内弟，任陈的军需处长，同时亦是陈的大管家。徐见刘家有十几个农民作客，怪问袁。袁回答云：“这些都是陈师长的佃客，来与刘东家拜年的。从正月初四、五日起到现在止，每天都是十四、五个或十五、六个不同样的佃客来拜年送礼，商量继续租佃耕种，不晓得他的佃客有好多……”就根据这

个情况来计称，陳的佃客当不下六百多人。又据三岔坝曾文彬先生介绍，他曾听到三岔坝李维綱（解放前在省机关任过职）说过，1943年，陳书农的管家拿红契到田粮处（温江双流记不清楚了）去验契，田粮处的验契人员见这样多，甚为诧异，用种来一称，契纸有十三斤半重。李又云：陳在温江双流的土地横竖几十里连接一起，没有别人的土地插花。仅这两个情况的介绍，陳拥有的土地，其数量已多得十分惊人。其他方面尚不清楚，但可断言，必不止上述两处材料。于此可见陳书农这个军阀拥有土地之多，亦说明四川军阀在混乱割据时期压榨人民之兇狠！

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

简阳地方武力及在乡军人反动集团的组成和活动

曾兆姜

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简阳反动集团，有由军阀余孽鼓动组成的“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有按蒋介石命令组成的“简阳县在乡军官会”，“简阳县青年军联谊会”。事虽有其“昙花一现”，但就这些伪集团的组成和活动，可见当日军阉面临危机，岌岌难堪，而一般依事附木之流，又唯以脱削民膏是务。兹将实际情节分别叙述，使后之览者，得悉旧社会混濁现象。

一、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

1947年夏，伪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通令全川各县成立“自卫总队”，分派爪牙任总队长，欲借以扩大实力。简阳自卫总队长一职，委任其旧部原傅伯诚充任，各乡镇中队长，即由各乡镇长兼理。平时抽调队丁一中队，集中县城，以资防卫，经费列入地方预算。

1948年4月，简阳县伪参议会开大会，军阀余孽廖雨辰，先期持“旅省简阳同乡会”刘邦俊、傅见吾等函件到县，向县城各机关及参议员吹嘘组织“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略谓：“戡乱之际，军务吃紧，地方秩序，难保无虞，凡我父老昆弟欲安居乐业，不受流离颠沛之苦，一切财物又不致被人掠夺，只有全县人士，联成一气，组织自卫机构，以策划万全之计……”等语。与此同时，伪参议会秘书曾兆姜曾向议长周云章建议：“事原自卫范围，不如推

託总队长傅伯诚电约各乡镇长到县会同商决，恭议会只从旁支持，将来添筹自卫经费，免致县人指责恭议会加重地方负担。”可是周云章回县，得连任要职，都倚刘邦俊、傅见吾等作靠山，怎敢违刘等的意旨，因此，对曾兆姜的建议未加考虑。及至举行会议那天周致开幕词后，即请廖雨辰出台，重申组织“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的意义。周首先赞扬旅省同乡诸公“关怀桑梓安宁”，我们应竭诚拥护，恭议员又多係地方豪绅，亦认为事属保护自己的权利，毫无异议，一致通过成立“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并推举廖雨辰为主任委员，刘邦俊、田颂尧、田泽宇、樊巨川、傅鲁唯、宋明煜等为常务委员，公决各乡镇长为当然委员，为推萧九如为总务处主任，综理财务、文书事项。廖雨辰即席宣告：“常住省会，主任委员职务，委託傅鲁唯代理，会同萧九如拟制章程，积极筹备一切事务。”伪恭议会立即录案转报四川省政府核示。议会闭幕后，傅鲁唯、萧九如即就县城南街阳安公司（建安社址）设席办公，参照“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章程”草拟“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条例”，约两月余乃脱稿，调恭议会雇员曾庶儒、萧绍隆前去缮写油印。傅萧两人商定，于1948年7月3日开全体委员会议，各乡镇长（当然委员）及县城机关负责人应傅鲁唯函约，齐集伪恭议会开“自卫”会议，到会者近百人。廖刘等驻省委员，联名具函请假，并希望傅鲁唯与到会乡镇长妥筹经费，以利自卫事务。会议由傅主持，议程为：①通过“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条例”，②照条例规定，傅鲁唯提出徐

孟明為政訓處主任，王文海為軍訓處主任（兩人都是“建安”骨干，引起“信誠”集團不滿）；③籌劃經費，提出“攤派”、“募捐”兩種辦法，經反復討論，決定“募捐”。

關於以上第③項議程的決定，當時有個青年鄉長張君學發言：“我們縣里大偉人很多，他們把積存的金條子捐一點出來就夠了，在他們是毛上拍毛，全縣人都沾了光。”全場拍手贊成，隨即公決：“劉邦俊、傅見吾、田頌堯每人捐金條三十根，廖雨辰、陳希農、田澤孚、樊巨川每人捐金條二十根，田亮熙、宋明忻、陳希年每人捐金條十根……”蕭九如即將捐金筆錄，加以整理，派雇員曾廣儒繕寫油印，連同條例當場分發各鄉鎮長，又分別郵寄各捐款人及成都各報館。午餐時，傅魯唯分向各席敬酒，祝賀此次會議結果圓滿。

劉邦俊等接到捐款通知，已極感不安，及見“新新新聞”掲載“簡陽巨公，捐金自衛”消息，更為忿恨。嗣後，周云章由成都回簡陽向曾兆姜說：“‘地方自衛委員會’應從此罷休，此事王主席不贊成，劉肇公（劉邦俊）他們，對傅魯唯的作法大不滿意，因為捐金列名登報，就等於向共產黨告他們一狀，將來好按名捉拿清標……。”可是傅魯唯尚不知趣，為了拉攏在鄉軍官作“建安”羽翼，還預約了一批充任軍訓職務的人員來擴張他的實力。

先是廖雨辰由簡陽回成都時，曾約同劉邦俊去見王陵基，請求批准“簡陽縣地方民眾自衛委員會”一案，但王對他們倡組這種機

构，别有看法，留中不发。延至同年10月，乃毅然严令简阳县县长林宏仁迅将不符法令规定之“简阳县地方民众自卫委员会”督促撤销。此后，除规定“自卫总队”经费外，不得借词另筹其他自卫款项。傅鲁唯得到这个消息，不得不“收刀检卦”。纷纷宣扬的“地方自卫机构”，阅六个月而告终。

二、简阳县在乡军官会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内战，节节失败，疑惧重重，好像泥水大败的蒋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为了防止散处各地失职军官混入“歧途”，乃令飭属四川省政府奉办全川各县在乡军官登记。又于一九四八年春，号召已登记的在乡军官集中省会，由成都军校负责人主持，向在乡军官们作几天的精神讲话，所说不外“拥护‘戡乱’，不入‘歧途’”。最后，宣布省府已通令各县遵办对在乡军官的优待办法，如：①就所在县组织“在乡军官会”联络感情；②协助县“自卫总队”办好乡村自卫事务；③县属机关职务空缺，即由县保委在乡军官中合格人员充任；④每人照优待出征军属规定，年领优待谷两石；⑤确係生活困难者，得申请酌拨所在县救济谷补助（这些办法係根据当时具体措施归纳几点来概括的，因手边没有资料，恐不尽如原文）。

以上给在乡军官这些优待，似属政府“德政”，实则还是滥发的“空头支票”，都对地方人民带来一些灾难和损失。

“简阳县在乡军官会”的负责人是樊诚、魏烈勋，成员约一百人。樊诚等去晤国民党简阳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徐孟明陈述经

过（徐是优待会负责人），徐即先照拨每人优待谷二石，并竭力代向各方面周旋，从此，“在乡军官会”与“建安社”渐渐打成一片。谈到代找职业，县属机关早被强有力者把持，只有民众教育馆长吴雪琴没有奥援，竟被挤开，保委樊诚继任，各乡自卫队长係无给职，大家都不愿干。樊诚是在乡军官会负责人，既借此名义得到出路，对其他赋闲朋友，不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县中既找不到事安插，于是就找不做事也要拿钱的门路，提出请求划拨积谷作补助的办法，面商徐孟明、傅鲁唯洽商，徐傅不但表示赞同，且先代向各方面疏通。在乡军官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和伪参议员及各机关负责人，非亲即友，在得到徐孟明等帮助之下，各方面都无异议，只待参议会开会通过，即可兑现。

1948年4月，樊诚等所具有参议员傅鲁唯等连署申请拨积谷一千石，以救济在乡军官生活一案，经参议会财务审查组吴澍等签具“既係省令规定，拟照拨”的意见，当提付讨论时，樊诚列席申诉理由，傅鲁唯等多数人发言表示支持，参议员中的在乡军官董雨波等坚持照审查意见通过，参议长周云章虽曾说：“县有财产，人民血汗大家多多考虑。”但没有人附和，结果决议“照拨”。在乡军官领得黄谷一千石，每人分得十石左右，旁人都以为该心满意足了，乃不久又发生围剿参议会请愿情事。

1948年10月，伪参议会开大会，在乡军官得悉此次要处理四川省银行退还的经建基金，相约赶到县城要求分拨，却不派代表向参

议会申述，而采取聚众要挟手段。开会的第三天晚饭后，部份参议员已外出，伪县长林宏仁迫至，与周云章在会客室约谈，突闻大门外人声嘈杂，任何人都不准外出，大喊：“请周云章出来说话。”周闻声色变，嗣后得悉是在乡军官请愿，林宏仁出去说：“请派代表进来谈。”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找周云章，不关你的事。”周见事不妙，乃同参议员黄补山从参议会左侧的矮房子翻出去，一直跑到石桥周寿如家躲藏。警察局长冷卓如听说县长被色围，恐发生意外，乃调集警察中队，持枪伏在在乡军官后面，林宏仁屡次出去打招呼，听到的回声是：“我们找周云章解决问题，不是棒客。”直闹了三点多钟，听说周云章已经跑了，才稍泄点气。最后，参议会秘书曾兆姜出去说：“今天夜深了，请等明天开会时再解决。”在乡军官们也感到疲乏，大骂周云章而去。经此一闹，参议员都不知出了什么事，附近居住的当晚即回家，远道的第二早晨就走了。参议会内只有几个雇员和工友，林宏仁借词出巡公出，在乡军官落得扫兴而归。事后，周云章叙述经过情节，分别电达省府及有关方面，宣告被迫休会，林宏仁又将肇事情节详报省府，在乡军官会受到严词申斥。以后虽气焰稍戢，而一切活动仍到解放后乃止。作恶多端的在乡军官游棍等，终受到人民裁判，处以枪决。

三、简阳县青年军联谊会

抗战胜利，响应参军的青年，大都复员回籍。简阳的潘瀛洲、宋南熹、李郁林……等亦于1947年冬季回县，依照复员时上级指示成

立“简阳县青年军联谊会”。会址即设在“国民党简阳县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周潘等参军，原係出自简阳三青团动员）。凡事多受徐孟明的支配。徐是“建安”骨干，遇事亦多赖潘等出力，旁人称潘等是徐的打手，“建安”干员。县属参军青年虽多，而常在县城各方面打交道的只有潘、宋、李等四五人。

1948年春，“简阳县在乡军官会”成立的同时，潘瀛洲等奉到省令，略谓：“……青年军联谊会与在乡军官一例，每人年领优待谷两石……。”徐孟明就借此支使潘等与周云章滋事。一天，周正在县城小什字晋丰茶社喝茶时，潘等待省令突来茶社请周签具意见，周不善应付，和潘等在茶社争吵，周怕丢面子，退回参议会暂避，殊潘等气势汹汹，追至会址，在会客室拍桌相骂，适曾兆萼前去，从旁劝解，并执笔在文件上签“照办”字样，注明月日，派事务员李阳鹤加盖参议会关防，交还潘等，结果，和在乡军官一样，每人领得救济谷十石，事乃平息。宋南熏、李郁林等是曾兆萼的学生，曾与宋等闲谈时，曾劝他们不要露出风头，招人忌妒，宋等亦表示赞同，当在乡军官闻省行退还经建基金消息，聚众要挟闹事时，他们亦就莫有附和。但是，国民党军队纪律，已坏到极点，潘瀛洲等在青年军中染得一些恶习，回县更得“建安”集团豢养，往往在街面提劲打靶，令人侧目。宋南熏要荐亲原姊妹去简城中心分校教书未遂，在四知路口茶社与李大祥斗殴。李郁林支使族人李某与棋仕鲁争夺乌木，招惹棋四维率领哥老弟兄夥持械到平泉镇与棋撑腰，几酿成剧